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4.03.001

杨飞:“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3期,第1-15页。

YANG Fei, “An Exploration of the Dual-geopolitical Roles of Buffer Stat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acific Journal*, Vol. 32, No.3, 2024, pp.1-15.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杨飞¹

(1.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缓冲国;大国和平;大国冲突;地缘作用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4)03-0001-15

一、问题的提出

缓冲国(buffer state)作为一种防止大国从事对抗性军事活动的手段在19世纪末至20世

纪初受到普遍欢迎。^①缓冲国C和被缓冲国(大国A和B)在特定地区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次级安全结构或地缘安全结构,一般被称为“缓冲体系”(buffer system)(详见图1)。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缓冲国的概念一直没有

收稿日期:2023-05-23;修订日期:2023-1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22VLS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飞(1992—),男,甘肃陇南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特任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地缘缓冲理论与实践、周边安全研究。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John Chay Thomas Ross ed., *Buffer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6, p.1.

出现在政治和研究议程中”。^① 缓冲体系长期以来被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忽视,成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领域。^② 然而乌克兰危机使缓冲国这一概念重新恢复了现实意义,国际学术界掀起了探究乌克兰是否为俄罗斯缓冲国的研究热潮。有学者强调,当前乌克兰危机、阿富汗战争、伊朗核危机、朝鲜半岛核危机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又被称为“不稳定弧形地带”,缓冲国正在成为军事冲突的爆发点。^③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我们需要缓冲国,以避免地区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④ 在理论范畴内,这些观点是相互对立而非互补的。那么缓冲国在大国地缘博弈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缓冲国在维持大国和平中是否有效,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功发挥其和平作用,学界对此依然缺少一个弥补彼此分歧的系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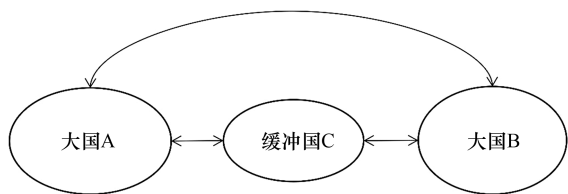


图1 缓冲体系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关于缓冲国的地缘作用研究,学界形成截然相反的两大派别。部分学者认为缓冲国是大国对抗的“竞技场”或“破碎地带”,不仅难以维持大国和平,反而会加剧大国冲突。张锡模即指出,“缓冲国作为强权竞相角逐影响力的区域的事实,导致的却不是冲突的避免而是冲突的升高与引爆”。^⑤ 具体而言,脆弱的缓冲国容易导致权力真空,诱使侧翼大国进行干预,特别容易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⑥ 因此,缓冲国实际上是国家灭亡的“高危群体”(high-risk group for death),相比于其他类型国家更容易被大国征服、吞并和占领。^⑦ 有学者特别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导弹等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缓冲国已经失去了其维护大国和平的作用,甚至已经过时。^⑧

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缓冲国作为一种客观

地理现象将继续存在,并对维护大国和平发挥积极作用。虽然世界上缓冲国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但是只要大国地缘博弈依然存在,缓冲国就不会消失。^⑨ 邱美荣特别指出,“缓冲”作为国际权力政治工具的现象不会消失,只是“缓冲”现象更为隐蔽。^⑩ 李晨阳强调,虽然当前军事技术和作战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但是缓冲国、缓冲区对于稳定大国关系依然重要。^⑪ 缓冲国的实力和内部治理对其缓冲作用的大小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内部统一、实力足以抵御侵略的缓冲国有助于国际政治稳定;但一个内部分裂、治理失败的缓冲国则可能成为大国战争的场所,前者以瑞士为例,后者以阿富汗为代表。^⑫

① Rebecca Pedi, “Small States in Europe as a Buff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Godfrey Baldacchino and Anders Wivel ed.,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Small Stat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0, p.168.

② Ksenia Efremova, “Small States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Buffer Effect’”,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13, No.1, 2019, p.100.

③ Sungtae “Jacky” Park, *Securing Strategic Buffer Space: Case Stud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Global Strategy*, 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016, pp. 1 - 2, <http://cftni.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Park-Sungtae-Official-2.pdf>.

④ Robin Poulton, “In Praise of Buffer States”, SSRN, September 10, 201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58588.

⑤ 张锡模著:《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6页。

⑥ Rajan Menon and Jack L. Snyder, “Buffer Zones: Anachronism, Power Vacuum, or Confidence Buil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3, No.5, 2017, p.8.

⑦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 2004, pp.311-344;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The Politics and Geography of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⑧ Rebecca Pedi, “Small States in Europe as a Buff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Godfrey Baldacchino and Anders Wivel ed.,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Small Stat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0, pp.183-184.

⑨ Tornike Turmanidze, *Buffer States: Power Policies, Foreign Policies and Concept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p.66.

⑩ 邱美荣:“国际政治中的‘缓冲单元’:内涵及属性——一项理论性探讨”,《欧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44-145页。

⑪ 李晨阳:“地缘缓冲区与中国周边安全”,《世界知识》,2017年第18期,第73页。

⑫ Rajan Menon and Jack L. Snyder, “Buffer Zones: Anachronism, Power Vacuum, or Confidence Buil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3, No.5, 2017, pp.1-25.

在某种意义上,缓冲国是“距离单位”,^①并将继续发挥维持大国和平的地缘作用,而缓冲概念背后的思想被认为适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②

由此可见,关于缓冲国的地缘作用目前仍然缺少系统化的研究。而且已经发表的相关成果要么聚焦于成功案例,强调缓冲国维持大国和平的地缘作用;要么侧重于失败案例,突出其加剧大国冲突的地缘作用。如何避免研究过程中的“选择性偏见”,是缓冲国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既有研究的观点针锋相对,却共同默认了缓冲国的客观存在,并在解释大国冲突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或分析工具。

二、缓冲国的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

通常而言,缓冲国是指“地理位置或政治上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之间的国家,其职能是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③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缓冲国是地处两个或更多强国之间的弱国,它是为减少强国间的冲突而维持下来,甚至创造出来的”“缓冲国可以大致分为见风使舵的国家、中立国和卫星国”。^④ 在实践中,缓冲国并不必然就是小国或弱国,而是与大国A和B的相对实力对比处于小国地位。^⑤ 不可否认的是,缓冲国是否成为缓冲国并不以其主观意愿而改变,更多取决于与其毗邻大国的意愿和能力。缓冲国经常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大国视为缓冲国。^⑥ 由上可见,缓冲国的定义基于大国视角,源自其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其目的本身是充当“挡泥板”(fender)或“保险杠”(bumper),^⑦潜在内涵是指缓和与大国冲突的国家。然而因为地缘环境的复杂变化,缓冲国并不必然缓和与大国冲突,反而有可能加剧大国冲突,这正是学界关于缓冲国地缘作用充满二元争论的原因之所在。

2.1 大国关系状态

缓冲国的建立一般基于区域大国地缘利益竞争的逻辑。^⑧ 而大国地缘关系又可分为四种:面对面、面朝背、背靠背、肩并肩。^⑨ 缓冲国一般

存在于大国地缘关系“面对面”的情况下,即大国扩张方向相对,缓冲国进而成为“中间之国”。虽然“两强夹一弱”的地理位置无疑是构成缓冲国的首要因素,但是任何忽略大国A和B“面对面”式地缘博弈的研究(详见图2),将不可能告诉我们缓冲国最初是为什么或以什么方式建立的。在缓冲体系中,缓冲国的地理位置虽然是一个常量,但是缓冲国身处其中的地缘环境则是变量,并且突出表现为大国A和B的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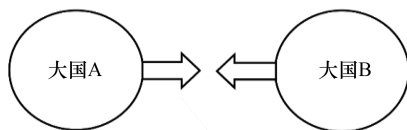


图2 大国“面对面”地缘关系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本研究将大国实力对比分为均衡与失衡两种类型。大国实力对比构成缓冲国存在与否的基本条件之一,即缓冲体系的整体稳定取决于大国力量分配的基本均衡(大国A和B都不能在缓冲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大国实力均衡对于缓冲国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大国A

^① Alan K. Henrikson, “Distance and Foreign Policy: A Political Geograph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3, No.4, 2002, p.454.

^② “Buffer States; Their Historic Service to Peace”,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5, No.180, 1955, p.337.

^③ John Chay and Thomas Ross ed., *Buffer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6, p.xiii.

^④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p.160.

^⑤ 相对实力衡量的标准是两个大国在冲突中战胜缓冲国的概率都大于0.5,而缓冲国战胜大国的概率都小于0.5。详见 Michael Greenfield Partem, “The Buffer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7, No.1, 1983, p.7.

^⑥ Tornike Turmanidze, *Buffer States: Power Policies, Foreign Policies and Concept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p.9.

^⑦ Trygve Mathisen, *The Function of Small States in the Strategies of the Great Powers*,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1, p.107.

^⑧ Bibek Chand, *Buffer States in Sub-Systemic Rivalries: Analyzing Nepal's Role in Sino-Indian Security Dynamic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18, p.47.

^⑨ 王鼎杰著:《二战大格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和**大国 B**不同的力量态势反映在各方的战略偏好中,或倾向于进攻,或侧重于防御,这构成缓冲国存在的基本安全背景。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平衡比良好意图的声明更安全”。^①正因为**大国**实力对比维持基本均衡,缓冲国的存在和维持成为可能。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特别指出“缓冲国依靠权力均衡而得以生存”。^②与此相反,大国实力失衡将导致**大国 A**或**大国 B**倾向于将缓冲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侵占缓冲国使其成为领土的一部分。在缓冲体系中,伴随**大国**实力对称程度的下降,大国进行单边干预的可能性不断增加。^③大国实力对比失衡往往导致相互冲突,主要是因为较强的一方拒绝妥协,而较弱的一方试图通过预防性措施占据争端中的缓冲国。

大国战略关系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体系性的战争与和平主要取决于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与管理。^④在缓冲体系中,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有助于解释缓冲国性质的变化。^⑤本文基于大国关系从友好到敌对的强弱程度,将大国战略关系简单分为大国竞合性关系和**大国**对抗性关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缓冲国研究的动态分析背景。其中,大国对抗性关系以敌对逻辑为其内核,大国竞合性关系以竞合逻辑为其内核。因为**大国**实力对比更多是空间维度的静态分析,尤其是**大国**实力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失效,所以在此引入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是有必要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不可否认缓冲国的地缘作用也在随着**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大国**对抗性关系时,缓冲国的客观安全价值较为突出,例如利用地理距离阻隔冲突等;在**大国**竞合性关系时,缓冲国的主观安全价值更为突显,例如安全感的供给。

大国关系状态构成了缓冲国地缘作用动态变化的重要背景。地理虽然是静态的,政治却是动态的。地理作用基于地缘政治的运动而变化,这是本文探究缓冲国地缘作用变化的逻辑基础。基于以上关于**大国**实力对比与**大国**战略关系的分析,本文将**大国**在缓冲体系中的关系

状态分为四类,并且分别对应缓冲国的四种地缘身份(详见表1)。有必要强调的是,严格区分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的概念边界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以上分类属于典型的理想类型,在实践中缓冲国往往兼具多种地缘身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一地缘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它们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差异,存在一定的动态联系。因此,这四个地缘概念在逻辑上并非是“互斥穷尽”的关系,然而基于概念在实践中的解释力,本研究认为以上四种地缘身份的类型学划分依然是可行的。

表1 大国关系状态与缓冲国的地缘身份

		大国战略关系	
		竞合性	对抗性
大国实力对比	均衡	和平区 (类型1)	竞技场 (类型2)
	失衡	势力范围 (类型3)	战略纵深 (类型4)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不容忽视的是,缓冲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对于其地缘身份和地缘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在**大国 A**与**大国 B**的互动之外,缓冲国对于**大国**的安全认知与政策调整将反作用于**大国**战略互动,进而影响到缓冲体系的维持与稳定。基于缓冲国战略选择的对抗程度,可将其概况为追随战略、中立战略和对抗战略。最为理想的缓冲国是奉行中立战略的国家,并且对维持**大国**和平发挥最大效力。然而缓冲国在实践中并不

^①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20.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③ Olav Fagelund Knudsen, "Eastern Europe: The Buffer Effect of a Cordon Sanitaire", in John Chay and Thomas Ross ed., *Buffer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6, p.89.

^④ 陈玉刚:“中国的大国关系与大国战略”,《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第12页。

^⑤ Joseph Maila, "Buffer States: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in John Chay and Thomas Ross ed., *Buffer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6, p.30.

存在绝对的单一战略选择,伴随着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聪明的缓冲国知道“什么时候一边倒,什么时候保持中立,什么时候谋求域外大国的支持”。^①

2.2 大国关系状态与缓冲国的地缘身份

(1)类型1: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基本均衡,大国战略关系属于竞合性时,缓冲国作为缓和和大国冲突的和平区。缓冲国的设计通常是为了帮助主要大国避免陷入困境和冲突的恶性循环。^②即使是弱小而脆弱的缓冲国,有时也有助于调节大国间的竞争。缓冲国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测试和释放大国战略竞争/对峙的压力(紧张局势),进而使得大国战略竞争/对峙富有弹性,在整体上维持着国际体系的稳定”。^③其具体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缓冲国的存在降低了大国间由于直接毗邻产生的恐惧感,并且提供了一种主观安全感。二是缓冲国的地理阻隔作用增加了大国A和大国B爆发直接战争的军事成本,进而降低了两国使用战争解决冲突的意愿。三是因为缓冲国的存在,大国A和大国B可以直接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当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时,普遍奉行中立战略,或者对冲、制衡等类似战略。

(2)类型2: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基本均衡,大国战略关系属于对抗性时,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缓冲国的内在矛盾是,尽管其意图是减少敌对国家间的直接冲突,但是其作为竞争势力范围的存在往往导致政治和军事对抗。^④从一个大国的角度看,控制(或吞并)缓冲国是保证地缘战略优势超过竞争对手的一种更可靠和风险更小的方式。不过,一个大国扩大其对缓冲国影响力的努力通常会引起另一个大国的反应,后者认为这种行为将直接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缓冲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如果大国间存

在激烈的对抗,将导致缓冲国直接成为大国冲突的战场,或者引发代理人战争。当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时,其安全战略以制衡或者追随战略为主,甚至不排除缓冲国对抗某一大国的战略选择。

(3)类型3: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势力范围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失衡,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属于竞合性时,缓冲国作为优势大国的势力范围。势力范围的关键特征是小国承认国际关系的等级制,主导大国在区域内发挥领导作用并提供安全保障。^⑤大国利用自身对于势力范围内附属国的支配性权力,构建并维护秩序。与此同时,弱势大国对强势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主导地位采取承认或默许的态度。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特别指出,虽然势力范围可能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但是它仍然属于一种秩序,并且“大国相互确认各自的地区优势地位,避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或者摩擦”。^⑥势力范围的存在事实上有助于大国和平的维持。当缓冲国被纳入优势大国的势力范围时,普遍奉行追随战略,这一战略选择既有可能是基于成本—收益理性计算后的主动选择,也有可能源于大国地缘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4)类型4: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战略纵深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失衡,并且

^① Michael Greenfield Partem, “The Buffer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7, No.1, 1983, p.25.

^② Rajan Menon and Jack L. Snyder, “Buffer Zones: Anachronism, Power Vacuum, or Confidence Buil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3, No.5, 2017, p.24.

^③ 周桂银:“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66页。

^④ Albert M. Tosches, “The Albanian Land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Buffer Region”, in John Chay and Thomas Ross ed., *Buffer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6, p.111.

^⑤ 其核心特征是大国对特定地区的“控制力”和“排他性”。详见阮建平、李齐:“回归还是调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7期,第2页。

^⑥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212.

大国战略关系属于对抗性时,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战略纵深。^① 这种情况下,缓冲国已经被大国瓜分或者吞并,进而失去缓冲国的地缘身份。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拉采尔(Ratzel)指出“辽阔空间保存生命”,^②即强调拥有战略纵深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作用。大国在战争时期倾向于占领或吞并缓冲国,主要原因是大国希望将战争成本转嫁给对手,并尽可能使本国领土置身于战火之外。因为缓冲国必须是完全独立或自治的,所以当大国吞并或者瓜分缓冲国后,大国A和B的领土直接接壤,缓冲国就此灭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被吞并的缓冲国领土相对于大国权力核心地区而言属于国家边缘地区,依然发挥着保卫国家核心地区的缓冲作用。不过,缓冲国一旦被大国吞并,作为独立国家的安全战略便不复存在,其民众层面将分化为两类:一类是追随占领者,另一类是反抗占领者。

对任何国家而言,地理与环境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必然存在正反两方面、有利不利两种情形”。^③ 因此,缓冲国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缘现象,既具有维持大国和平的积极作用,也具有加剧大国冲突的消极作用。缓冲国究竟发挥怎样的地缘作用主要取决于其在大国关系状态中所扮演的地缘身份。当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和势力范围时,事实上发挥着维持大国和平的地缘作用;当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和战略纵深时,事实上发挥着加剧大国冲突的地缘作用。其中,势力范围虽然以牺牲小国的主权为代价,但是通过构建地区性的霸权体系被认为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维持。^④ 不过缓冲国作为势力范围的缓冲作用明显弱于作为和平区的缓冲作用。

缓冲国是大国博弈的产物。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大国博弈中设置缓冲国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缓冲国主要有瑞士、普鲁士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诸多公国。^⑤ 而自1815年维也纳体系确立后,缓冲国不断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主要原因是伴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

夺向欧洲以外地区扩展,在亚洲、非洲等地进而形成多个缓冲国。由此可见,缓冲国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涉及大国博弈与国际体系的扩展。时空背景的变化无疑对缓冲国的存在及其作用构成潜在制约,是缓冲国研究难以回避的前提条件。为了更为充分地理解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有必要将其置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

三、比较案例分析:基于阿富汗、暹罗和波兰的缓冲国历史实践

大国实力对比和两国战略关系共同构成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转型的结构性要素,对国际体系稳定与否具有重要影响。而在缓冲体系中,缓冲国是否能够缓和两国冲突、维持两国和平,与两国实力对比和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本部分即主要探究在国际体系转型(即从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1871—1945年)的不同阶段缓冲国地缘身份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缓冲国维持两国和平与加剧两国冲突双重地缘作用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1871年至1945年是典型的国际体系转型阶段:1871年德国统一并开始崛起进程,维也纳体系(地区性国际体系)面临挑战并逐渐解体;1945年雅尔塔体系确立(全球性国际体系),国际体

① “战略纵深”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在狭义层面,战略纵深主要是指某一国内部领土,即边界军事部署与国家核心地带的地理空间;在广义层面,战略纵深可以包括军事盟国、缓冲国(势力范围),其军事力量可以部署到国家领土之外。为了避免缓冲国地缘身份的混乱,本研究主要选择狭义概念,强调两国吞并缓冲国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谋求军事力量的更前沿部署,进而扩展本国的防御空间。

② Andreas Dorpalen, *The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 Geopolitics in Action*, Farrar & Rinehart, 1942, p.93.

③ 王艳阁著:《地缘探究》,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82页。

④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89.

⑤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系转型完成。虽然这一进程中存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被认为更多是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本研究比较案例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尤其是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的地缘身份变化对大国和平将发挥怎样的地

缘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选择的三个案例中,阿富汗(1873—1917年)和暹罗(1896—1918年)处于国际体系转型前期,并位于权力边缘地区;波兰(1918—1945年)处于国际体系转型中后期,并位于权力核心地区,比较案例选择要素详见表2。

表2 比较案例选择

缓冲国	阿富汗 (1873—1917年)	暹罗 (1896—1918年)	波兰 (1918—1945年)
被缓冲国	英国、俄国	英国、法国	苏联、德国
大国类型	海权—陆权	海权—海权	陆权—陆权
大国扩张方向	南北方向	东西方向	东西方向
缓冲国地形	山地	山地	平原
缓冲国状态	保护国到独立国	独立国	独立国到国家灭亡,再到复国
大国关系状态与 缓冲国地缘身份	类型2 (1873—1907年) 竞技场	类型2 (1896—1904年) 竞技场	类型2 (1918—1921年) 竞技场
			类型1 (1921—1939年) 和平区
	类型1 (1907—1917年) 和平区	类型1 (1904—1918年) 和平区	类型4 (1939—1945年) 战略纵深
			类型3 (1945—1989年 ^①) 势力范围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3.1 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的缓冲国(1873—1917年)

阿富汗地处南亚和中亚之间,既是历史上著名的“十字路口”,又被视为“不可穿越的堡垒”。^②19世纪下半叶,英国和俄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面对面”扩张,其势力在阿富汗相遇,阿富汗成为“二狮之间的山羊”。^③本研究将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缓冲国的时间节点界定为1873—1917年,主要原因如下:1873年,英俄两国通过《格兰维尔—戈尔恰科夫协议》(Granville-Gorchakov Agreement),^④俄国代表戈尔恰

科夫亲王宣称阿富汗完全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① 波兰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缘身份到1989年才结束,但因为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进程(1871—1945年)这一阶段,故主要聚焦于1945年之前的历史实践。

^② Zarena Aslami, “Buffer Zones: Notes on Afghanistan, Race, and Empire”, *Victorian Studies*, Vol.62, No.3, 2020, p.435.

^③ 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1页。

^④ 《格兰维尔—戈尔恰科夫协议》又被称为《1873年英俄协议》(Anglo-Russian Agreement of 1873)。

之外,两国均承认阿富汗现有边界。^① 1917年,沙皇俄国的覆灭与英国的衰落导致了中亚大博弈事实上的结束。因此,本文将1917年作为这一缓冲体系结束的时间节点。

(1) 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的竞技场(1873—1907年)

在1873—1907年,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2。具体而言,英俄在殖民地问题上发生了许多惨烈的冲突,两国间存在许多政治对抗和公开敌意,大国战略关系属于对抗性范畴,或者所谓的“高度对峙关系”。^② 然而英俄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保持基本平衡,阿富汗故而成为英俄地缘博弈的竞技场。俄国在陆地上展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实力,在海上则是较弱的地缘政治实力;英国在海上展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实力,在陆地上则是较弱的地缘政治实力。^③ 在英俄地缘博弈中,俄国奉行进攻型安全战略,谋求印度洋出海口;英国则更多地属于防御型安全战略,试图巩固印度西北部边境安全。对于英国而言,缓冲国的设立是欧洲国际体系均势理念与政策的延伸,目的在于维持英俄两大帝国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权力平衡。因此,英国与阿富汗的关系始终受到俄国穿越阿富汗进攻印度这一潜在威胁的影响。英国倾向于通过维持印度周边的缓冲国或友好政权来确保印度的安全,这与其所谓的“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y)、“科学边疆”(scientific frontier)政策是一致的。即英国的利益并不是为了支持缓冲国,而是为了扩大英帝国的远方屏障。^④ 对于俄国而言,阿富汗是俄国进军印度洋的最后一道屏障。1873年3月8日,俄国军官尼古拉即记录到,“在这里,我是驻中亚的俄国陆军的参谋军官,这支军队将在一个美丽的日子跨越阿富汗,占领英属印度!”^⑤ 19世纪初期,英属印度与沙皇俄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两千英里,但是到19世纪末期,这一距离已缩小到几百英里,在某些地区甚至还不到二十英里。^⑥

(2) 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的和平区(1907—1917年)

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在圣彼得堡

签订《俄国和英国之间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专约》(又称《英俄协约》,Anglo-Russian Entente),两国就阿富汗问题达成和解,两国关系开始从对抗性博弈转向竞合性博弈。《英俄协约》指出,“英国政府声明,它没有改变阿富汗政治地位的意图。……不在阿富汗采取、也不鼓励阿富汗采取威胁俄国的措施。……俄政府方面声明,它承认阿富汗处于俄国势力范围之外;它允允,在它同阿富汗的一切政治关系中都通过英国政府作中介,并承认不向阿富汗派驻任何代表”。^⑦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依然保持基本平衡,谁也难以绝对控制阿富汗,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1。阿富汗在1907至1917年事实上成为英俄两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有效缓和了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对抗程度。《英俄协约》的签署使阿富汗“不再是俄国向印度进行阴谋的一块园地,英国也解除了百年来对于俄国妖怪的忧虑”。^⑧ 英国政府知道并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缓冲国将抵制使用武力来改变其内部政策或吞并其在印度的领土。^⑨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英俄两国在1907年就波斯和阿富汗各自势力范围间达成尊重缓冲国的协议,源于两国在

① Mohammad Hassan Kakar,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863-1901*, Brill, 2006, p.223.

② Peter Wallensteen, *Peace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11, p.47.

③ 有学者将“地缘政治实力随地理形态的改变而出现相应的变化”称之为地缘政治的“耦合法则”。详见王艳阁著:《地缘探究》,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61-62页。

④ Michael Greenfield Partem, “The Buffer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7, No.1, 1983, p.12.

⑤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著,陆大鹏译:《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17页。

⑥ [英]彼得·霍普柯克著,张望等译:《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⑦ 《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22页。

⑧ [美]悉尼·布拉德肖·费伊著,于熙俭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大国博弈之殇》,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页。

⑨ “Buffer States: Their Historic Service to Peace”,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5, No.180, 1955, p.337.

欧洲地区应对德国崛起挑战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英俄“大博弈”中,尤其是1907年至1917年,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缓冲国,英俄两国在阿富汗从未发生过战争,有效维持了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3.2 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的缓冲国(1896—1918年)

在19世纪,东南亚半岛地区“隐藏在现代大陆版图绘制之下的动荡不安主要是由于英法的对抗”。^①而在大国势力范围中间最有可能出现缓冲国,这标志着缓冲国的敌对侧翼大国都认为占领中间领土对其实现影响力的成本超过了收益。暹罗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英印政府自西向东、法属印度支那自东向西“面对面”扩张的“中间之国”。而暹罗作为缓冲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与英法两国的利益计算不无关系,这里大国可能付出的成本又与暹罗独特的地形、民族主义抵抗的能力密切相关。本研究将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缓冲国的时间节点界定为1896—1918年,主要原因如下:1896年,英法签署协议划分两国在暹罗的势力范围,暹罗进而成为英印政府和法属印度支那间的缓冲国。而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暹罗作为战胜国,开始废除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缓冲国的地位进而结束。

(1) 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的竞技场(1896—1904年)

英法两国加紧对暹罗的争夺是1855年《鲍林条约》签订后带来的直接结果。1886年,缅甸成为英印政府的一个行省。与此同时,法国开始其在印支地区的势力扩张,柬埔寨(1863)、越南(1884)、老挝(1893)先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英、法两国从东西两面形成了对曼谷王朝的夹击之势,都妄图独吞暹罗。这一时期,大国关系属于类型2,英法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保持基本平衡,大国战略关系为对抗性范畴,暹罗进而成为英法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在英法中南半岛地缘博弈中,英国处于被动地位,更多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强调对暹罗的经济控制;法国处于主动地位,更多属于战略进攻性质,倾向于在暹罗

的领土扩张。^②显然,在英印政府看来,“防御的原则是通过插入一个保护区来阻止敌人的前进”。^③英国试图通过设置缓冲国遏制法国自东向西的扩张势头。基于此,1896年1月15日,英法两国于伦敦发布《法国和英国关于暹罗等地的宣言》,明确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保证暹罗的独立,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军队开进暹罗的中部地区。^④

(2) 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的和平区(1904—1918年)

1904—1918年,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1,即英法大国实力对比基本均衡,大国战略关系由对抗性逐渐转向竞合性。1904年4月8日,英法两国在伦敦发表《法国和英国关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声明》,是《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的重要协议之一,重申1896年的内容,并明确各自势力范围。《法国和英国关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声明》指出“缔约双方放弃兼并暹罗领土的一切想法”。^⑤由此可见,英法两国都认为,保持暹罗作为缓冲国而不是殖民占领是明智的。^⑥强大的缓冲国拥有足够的物质能力来抵御侵略,或至少使侵略成本高昂、地理位置可防御、内部凝聚力强大、有效的政治组织和内部合法性。^⑦这无疑是缓冲国的理想模型,现实中并不存在享有以上所有优势的国家。但暹罗在英法博弈中,依靠国内改革,提升了民族凝聚力,充实了防御力量,这也是其能够保持国家

① [澳]安东尼·瑞德著,宋婉贞等译:《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9页。

② 黄焕宗:“试论泰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原因”,《南洋问题》,1985年第3期,第58页。

③ “Buffer States: Their Historic Service to Peace”,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5, No. 180, 1955, p. 335.

④ 《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6页。

⑤ 同④,第246—247页。

⑥ Patit Paban Mishra, *The History of Thailand*, ABC-CLIO, LLC, 2010, p. 90.

⑦ Rajan Menon and Jack L. Snyder, “Buffer Zones: Anachronism, Power Vacuum, or Confidence Buil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5, 2017, p. 8.

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3.3 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的缓冲国(1918—1945年)

“波兰”在斯拉夫语中意为“平原”或“平原之国”。^①由此可见,波兰缺少地理屏障的地形天然地有利于敌对大国的进攻。本研究将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缓冲国的时间节点界定为1918—1945年,原因如下:1918年,波兰复国,其复国本身即源自当时欧洲大国在苏德之间组建一个缓冲地带的战略考虑。1945年,德国战败标志着苏德实力对比的彻底失衡,以及国际体系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功转型为雅尔塔体系,波兰在这一背景下再次复国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波兰事实上再次亡国;但是波兰在1939—1945年成为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如果缓冲国是有用的,为什么波兰会被大国瓜分。

(1) 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的竞技场(1918—1921年)

虽然波兰在1918年被视为苏联和德国的缓冲国而复国,但在1918—1921年,波兰成为苏德事实上的竞技场,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2。在许多情况下,缓冲国是由大国在战争后的和平解决方案中设计或默认产生的。相关协议澄清了大国彼此的势力范围,缓和了强大对手间的安全竞争,并使其转向国家内部重建。^②1918年波兰复国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即不断强调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国的必要性。“东欧领土重新安排之稳定的条件是,领土必须划分为三个而非两个国家体系。德国与俄国之间必须有一系列的独立国家,这至关重要。”“德国与俄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完全的领土缓冲带。”^③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战结束以后,9个东欧国家独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并成为德国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国。不过因为当时德国和俄国实力遭到打击,缓冲国的建立并未考虑德国和苏联的

意愿与利益,进而为苏德两国在1939年改变波兰现状埋下了伏笔。缓冲国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尤其是当国家卷入领土争端的时候,国家灭亡的可能性更大。^④由于《凡尔赛和约》中并未明确东欧各国的边界,波兰与苏俄、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均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

(2) 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的和平区(1921—1939年)

虽然苏波、德波关系在1921—1939年多有起伏,但波兰的存在事实上缓和了苏德关系,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1。1932年,波兰与苏联签订《波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放弃以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互不侵犯;缔约一方如遭到第三国进攻,另一方应严守中立;双方互不参加任何敌对性的条约和同盟,并保证通过外交途径或专门公约规定的有关调解程序,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⑤该条约有效期3年,随后又延长10年。在缓冲体系中,任何一个大国对缓冲国的最小行动和压力都会立即引起另一个大国的反应。^⑥希特勒对《波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苏波关系的改善感到不满,但又无计可施。因此德国开始逐渐改善与波兰的关系,1934年,波兰与德国签订《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政府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问题,双方将通过协商解决相互的关系问题。不可否认,波兰的这一决策事实上扩展了其生存空间。但是苏德固有的结构性

① 高德平、高空编著:《列国志·波兰》(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② Rajan Menon and Jack L. Snyder, “Buffer Zones: Anachronism, Power Vacuum, or Confidence Buil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3, No.5, 2017, p.16.

③ [英]哈福德·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37页。

④ Brandon Valeriano and John Van Benthuyzen, “When States Die: Geographic and Territorial Pathways to State Dea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3, No.7, 2012, pp.1165-1189.

⑤ 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3页。

⑥ Mohammad Reza Hafeznia, Syrus Ahmadi, Bernard Hourcad,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Buffer Spaces”, *Geopolitics Quarterly*, Vol.8, No.4, 2013, p.28.

矛盾难以避免,两国遵守条约的意愿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增长而下降。

(3)波兰作为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1939—1945年)

在苏德中欧地缘博弈中,这一时期的苏联更多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德国更多属于战略进攻性质。而在实力对比层面,苏联相对德国要弱一些,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4。缓冲国的存在扩大了大国安全防御的战略纵深,当大国间爆发战争时可以“迟滞和重创装甲部队的进攻”。^①然而将邻国更多地视为“战略纵深”地区而非主权实体的国家,更有可能忽视对主权的关切,进攻性地使用缓冲区。^②1939年苏德两国瓜分波兰,波兰再次灭国,但是波兰领土成为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对两国权力核心地区起到拱卫作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至少为苏联在西部边界上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为苏联扩军备战赢得了更多时间”。^③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广播演说》中强调,“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④当波兰领土成为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缓冲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极其脆弱的,并且以牺牲波兰的主权和领土为代价。

(4)波兰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5—198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的海上支配大国地位和苏联的陆上支配大国地位。^⑤这一时期苏联与西欧国家相比在实力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战略关系属于竞合性质,苏联进而倾向于将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大国关系状态为类型3。苏联历史上多次在西部遭到外敌入侵,苏联领导人进而认为在西部边界确保邻国友好(或至少是虚弱的)对于其国家利益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在斯大林看来,东欧地区不仅是苏联与西方“军事上的缓冲地带”,也是苏联抵抗来自西方“各种思想和心理挑战的外部防线。”^⑥早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谋求将东欧地区变为由卫星国组成的前沿地带,也是应对西方集团威胁的缓冲地带。因此,1945年波兰的地缘角色转换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其安全战略只能选择追随苏联,即对苏“一边倒”。直到1989年苏东剧变,波兰才真正摆脱其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缘身份。

四、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

在国际体系转型中,世界权力中心并不是由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位于中心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世界权力中心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这一地区必须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所在地;其二,这一地区是大国激烈争夺的地区。^⑦而在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1871—1945年)中,欧洲大陆成为权力核心地区,欧洲以外为权力边缘地区。本研究在比较案例分析部分,基于对阿富汗、暹罗作为权力边缘地区的缓冲国实践和波兰作为权力核心地区的缓冲国实践,试图探究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国际体系转型对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影响特定地区缓冲体系的稳定与否,间接影响缓冲国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的变化。

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动态的过程,而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不同阶段性质是不同的。在

① [英]帕特里克·奥沙利文著,荣旻译:《战争地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② Lionel Beehner and Gustav Meibauer, “The Futility of Buffer Zon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rbis*, Vol.60, No.2, 2016, p.262.

③ [英]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集(1941—1945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⑤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p.34.

⑥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⑦ 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页。

国际体系转型初期,既有国际体系相对稳定,其和平性质更为突显;而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后期,转型速度加快、结构性矛盾激化,其对抗性质更为明显。美国学者兰德·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将国际体系转型视为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断升高的过程。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中后期,“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它是霸权生命周期内一段辉煌的稳定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而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持续不断的危机与动荡。世界政治不是刚刚进入这一阶段,就是正在迅速地接近这一阶段”。^①而缓冲国的建立、维持和消失从一开始便被嵌入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中。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即认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将因为长周期的阶段不同而不同。^②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不同阶段,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特定地区缓冲体系的稳定,缓冲国的地缘身份也随之调整,其地缘作用在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间相应转换。换言之,“身份永远是过程中的身份”,^③缓冲国可以从和平区转换为竞技场,甚至成为优势大国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

1871年德国统一后,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开始下降。^④然而在整个19世纪末期,西方大国忙于瓜分殖民地,对于德国崛起并未给予特别关注。英俄两国在亚洲内陆展开大博弈,英法两国则在非洲、中南半岛划分势力范围。显而易见,在国际体系转型初期,大国在权力边缘地区的博弈更为激烈,具有更强的对抗性,因此缓冲国更多地成为大国在特定地区进行地缘博弈的竞技场。而20世纪初期,欧洲大国的注意力开始从殖民地世界转回欧洲大陆,以应对德国崛起对英、法、俄等国构成的地缘挑战。即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期,大国开始调整各国在权力边缘地区的利益,以竞争性博弈为主,这使得阿富汗、暹罗等缓冲国的和平性质更为突出,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关于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阿富汗、暹罗和波兰的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详见表3。这一时期权力核心地区的地缘博弈则转向对抗性,缓冲国从

和平区角色进而转向竞技场,甚至是被大国侵略、吞并。典型的案例即是比利时、荷兰等缓冲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国家灭亡。20世纪上半叶,波兰作为权力核心地区的缓冲国,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因为在国际体系转型的末期,大国对抗的色彩远高于其他时期,大国战略利益的不可调和导致缓冲国要么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要么大国直接吞并缓冲国以保持其战略优势。

虽然本研究把缓冲国地缘作用变化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缓冲体系中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的动态影响,但是国际规范对于缓冲国的战略自主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缓冲国维持大国和平的效力。当国际规范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时,缓冲国的自主得不到大国的保证;而当国际规范强调民族自决、主权平等时,缓冲国的自主性不断提升。在本研究中,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大国协调属于典型的“强国俱乐部”,小国缺少表达其观点的途径和施加影响的手段。然而伴随国际规范的变化,尤其是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弱国“发言”的机会不断增加。^⑤而且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小国的高存活率。自1945年以来,国家因为暴力入侵和占领而灭亡的数量急剧减少。法扎尔(Tanisha M. Fazal)在1816—1992年确定的50起国家暴力灭亡事件中,只有2起发生在1945年之后:即1975年的南越和1990年的科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Maxwell's Demon and the Golden Apple: Global Discord in the New Millenniu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8.

②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0, No.2, 1978, p.234.

③ Qin Yaq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2, 2010, p.149.

④ Tim Sweijs, "The Role of Small Powers in the Outbreak of Great Power War", Centre for Small State Studies Publication Series, Occasional Paper-1, University of Iceland, 2010, p.20.

⑤ Martha Finnemore,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Changing Belief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

威特。^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是外在环境的变迁给小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条件。^②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民族国家构建,或者民族认同不断强化——任何大国

吞并缓冲国的行为一方面将使其陷入当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将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面临不同程度的制裁与惩罚措施,而这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强化的时代可谓是致命的。

表3 阿富汗、暹罗和波兰的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

缓冲国	国际体系转型阶段	时间	大国关系状态	地缘身份	地缘作用
阿富汗	前期	1873—1907年	类型2	竞技场	加剧大国冲突
	中期	1907—1917年	类型1	和平区	维持大国和平
暹罗	前期	1896—1904年	类型2	竞技场	加剧大国冲突
	中期	1904—1918年	类型1	和平区	维持大国和平
波兰	后期	1918—1921年	类型2	竞技场	加剧大国冲突
	后期	1921—1939年	类型1	和平区	维持大国和平
	后期	1939—1945年	类型4	战略纵深	加剧大国冲突
	后期	1945—1989年	类型3	势力范围	维持大国和平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除此之外,缓冲国的地形差异、国家治理能力强弱,以及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安全逻辑差异都对缓冲国的独立与战略自主性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就地形而言,阿富汗、暹罗的山地相较于波兰的平原,更有助于缓冲国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国家独立。就国家治理能力而言,暹罗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即与朱拉隆功锐意改革、努力提升国家实力密切相关。暹罗通过现代化常备军建设,使得英法两国不得不考虑武力吞并暹罗需要付出的军事代价。而阿富汗、波兰则因国内政治派别分裂,国家缺少凝聚力,很容易陷入代理人战争或遭到武装吞并。就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安全逻辑差异而言,海权大国相对于陆权大国更倾向于维持缓冲国的独立。^③例如,本研究中的海权国家英法博弈基本上保证了暹罗的国家独立;而陆权国家苏德博弈则在1939年将波兰直接瓜分,海权国家英国与陆权国家俄国的博弈中,阿富汗成为半独立国家。

五、结 语

历史上,大国在地缘博弈中设置缓冲国是

维持其势力均衡的重要方式之一。不过缓冲国的使用虽然较为敏感,但是其实质内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所反映的“缓冲思维”对于管控大国战略竞争仍然具有借鉴价值。诚如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所强调,“学术不应该仅仅因为在政治上受到指控或争议,就放弃接纳在分析上有用的概念或提出重要的议题”。^④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同样认为,即便是最陈旧的概念,其背后的经验依然是有借鉴价值的。^⑤如果我们想对现实境况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重新审视曾经的概念及其经验依然是必

^①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The Politics and Geography of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1-23.

^② 韦民著:《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

^③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9.

^④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xiii.

^⑤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8页。

要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正处于结构性转变与战略性调整时期。^①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②即人们普遍按照现实需求重构历史,本文对缓冲国的研究无疑反映了当下国际体系转型加速和 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关照。察势者智,驭势者赢。鉴于此,中国努力塑造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战略缓冲,从“顺势”到“谋势”,有助于避免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③

当前,现代技术虽然弱化了物理或空间屏障的有效性,但是并没有减少对缓冲国的需要。^④即使交通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时间距离,然而只要人类的移动速度不是瞬时性的,空间距离便不会消失,反而在高精尖技术下变得更为敏感和脆弱。当核武器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时,大国战争依然以常规武器为主,克服地理空间进行武力投射仍然是代价高昂的行动,其中时间差具有不容忽视的战术意义。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即强调,“技术可以超越地理,但技术同样可以增强地理的重要性。”^⑤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的遭遇无疑是对“地理过论”的否定。正是因为高精尖武器的不断发展,大国间的不安全感渐趋强烈,缓冲国的主观安全价值更趋突显。缓冲国的存在减少甚至消除了大国直接毗邻固有的危险,其“中间之国”的地缘位置客观上提高了大国间的安全感。因此,缓冲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或许会发生改变,但是只要大国博弈继续存在,缓冲国现象就不会消失,并且在“缓和敌对国家间冲突方面的战略作用仍然存在”。^⑥进入21世纪,“缓冲国”概念上向“缓冲区”(buffer zone)、^⑦“缓冲空间”(buffer space)、“缓冲复合体”(buffer complex)转换,内容上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扩展,形态上从物理层面向理念层面延伸。例如,土耳其即被视为欧洲国家应对难民危机的缓冲国,^⑧是这一概念在区域治理中的积极尝试。本研究并没有刻意放大缓冲国在维持大国和平中的地缘作用,而

是努力探究缓冲国在大国博弈中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进而丰富管控大国战略竞争的策略选择工具箱。其中缓冲国概念的演变及其蕴含的“缓冲思维”在管控大国战略竞争中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责任编辑 邵雯婧

① 仇华飞:“国际体系转型与当代美国对外战略——兼评《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26页。

②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页。

③ 当然,我们更要警惕部分大国以建立缓冲国、缓冲区为名支持我国民族分裂势力,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④ Gerald L. Ingalls, “Buffer States: Outlining and Expanding Existing Theory”, in John Chay and Thomas Ross ed., *Buffer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6, p.236.

⑤ [美]罗伯特·卡普兰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地图上的大国争斗及对地理宿命的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⑥ Boaz Atzili and Min Jung Kim, “Buffer Zone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Geographic Separation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No.2, 2023, p.664.

⑦ buffer zone 在国内的常见翻译有“缓冲区”“缓冲地带”。

⑧ E. Fuat Keym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Arab Spring Era: From Proactive to Buffer Sta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12, 2016, pp.2274-2287.

An Exploration of the Dual-geopolitical Roles of Buffer Stat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ANG Fei¹

(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buffer states and the buffered states (one weak between two strong powers) constitute a special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The buffer states are regarded as the peace zone to maintain the peace between great powers and they are also seen as the arena of aggravating great power conflicts. This situation always triggers disagreements and debates about their geopolitical roles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study selects three buffer stat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the Vienna System to the Yalta System, 1871-1845): Afghanistan (Anglo-Russian game, 1873-1917), Siam (Anglo-French game, 1896-1918) and Poland (Soviet-German game, 1918-1945), explor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geopolitical roles of the buffer stat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region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buffer states have dual geopolitical roles of maintaining peace between great powers and exacerbating their conflicts, while their geopolitical roles vary with the change of their geopolitical identities among peace zones, arenas,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strategic depth. The buffer state has been seen as a historical concept of reflecting a certain historical burden, while its inherent buffer thinking has positive values in managing conflicts between great powers. This study draws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China to strive to shape a strategic buffer in the space-time dimension, and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uffer states; great power peace; great power conflict; geographical role